

在石油与安全之间摇摆的日以关系

郭培清

内容提要 日本与以色列的关系深受石油和安全两种因素影响，摇摆于阿拉伯产油国和美国之间。在石油危机发生之前，日以关系冷淡；1973年后，日本“亲阿反以”；随着石油因素趋弱，日本在阿以之间建立“平衡关系”；冷战结束后，日以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日本力图保持中东政治稳定，以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安全和石油框定了日以关系的活动边界，但就目前而言，日以关系的发展在保持增强的趋势。

关键词 日本 以色列 美国 石油 安全 阿拉伯

作者简介 郭培清，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青岛 266003）。

日以关系属典型的受外部因素影响的双边关系。建交后两国关系长期保持非正常的外交状态，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才步入正轨。这种特殊关系能够存续40年之久，其背后的维持力是什么？除了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家能够影响日以关系外，还有什么因素能操控日以关系？深入研究日以关系这一典型案例，对于揭示日本外交“自由”的缺失或许较能说明问题。该领域日本等国学者已积累不少研究，体现了研究者的自我视角。¹ 但只有将日以关系放在石油与安全的二元格局里予以分析，并探求日以相互关系中的“实用主义”本质，才能宏观把握日以关系的变化。

1973年之前日本“亲阿”而“不反以”

历史上日本与以色列没有恩怨，且同情犹太建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没有配合纳粹德国的消灭犹太人行动。个别日本人，如驻立陶宛领事三浦秋原、犹太学家拙素户什等还帮助犹太人从欧洲转道日本逃往中国。因此，建国后以色列对日本颇有好感。

1952年旧金山和会后日以两国建交，以色列在东京建立了公使馆。当时，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中东只是一个能源供应地，廉价的石油像其他商品一样，无短缺之虞。以色列这样的蕞尔小国，政治意义不大，因此日本对阿以冲突冷眼旁观。同样，以色列认为战败的日本偏居亚洲遥远的另一端，是国际政治中的边缘力量，不值得重视。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在1973年之前日本对中东的政策是“不明朗”和“中立”的。

但日本能源消费模式的改变决定了日本必然会趋向亲近阿拉伯国家。1954年之前，日本政府限制石油

¹ Akifumi Ikeda “Japan’s Relations with Israel”, in Kaori Sugihara and J. A. Allan eds., *Japa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156–162. Ben-Ami Shillony, “Japan and Israe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Ronald A. Moore eds.,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in Alliance Politics* Bos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86, pp. 83–84. Yasumasa Kuroda, “Japan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in Edward J. Lincoln eds.,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90, pp. 43–44. Kurt W. Radtke, “Japan–Israel Relations in the 1980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5, May 1988, p. 527, etc.

消费,鼓励使用煤炭。在美国的督促下,从1954年起,日本的能源消费逐步转向以石油为主。¹1953年石油占日本能源消费比重的23%,1963年迅速提高到60%,1973年石油危机前达到80%。^④石油消费的迅速增加,必然影响到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走向。^⑤1970年日本政府在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第2628号决议,这份决议声称,“确认尊重巴勒斯坦人之权利系建立中东公正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之因素。”^⑥当时很少几个西方国家投赞成票。^⑦因此,将1973年之前的日本对中东政策理解为“严守中立”是不客观的。阿拉伯国家视日本为准友好国家。凭借这种感情优势,日本的石油供应顺畅无阻。^⑧

此外,中东阿拉伯富油国是日本出口商品、换取外汇的重要市场。20世纪60~70年代初,日本的工业品大量供应中东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快速增长。日本对中东出口额从1960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1970年的10亿美元,翻了近5番;进口额从4.5亿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1980年出口额进一步增长到151亿美元,进口额增长到450亿美元。“石油+市场”决定了日本对中东外交的方向。为了巩固“石油友谊”,日本积极培养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贷款,如为埃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2年)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贷款。^⑨

与日本-阿拉伯“友谊”相比,日以关系则十分冷淡,尽管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但在对中东政策上日本却表现出冷战时期罕有的“反抗精神”,在阿以矛盾中偏向阿拉伯国家一方,与以色列保持极其有限的非官方接触,^⑩甚至“主动”参加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抵制以色列运动。

早在以色列成立前的1945年,阿盟就提出如果以色列建国,它们将联合抵制之,对以色列“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起初,阿盟将抵制以色列的国家范围仅限于阿盟成员。后来,将参与抵制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要求其他国家只有不与以色列有实质性交往,阿拉伯国家才会与它们打交道。为了监督执行情况,阿盟在大马士革设置“联合抵制中心”^⑪。日本政府“积极响应”,将《大马士革议定书》翻译出版,下发给各大公司,促其遵守(日本是唯一翻译出版该议定书的非阿拉伯国家)。^⑫1952~1985年,日本政府与以色列几乎没有任何贸易和交通上的正式直接往来。日本公司不仅不使用以色列港口,甚至拒用悬挂以色列国旗的他国船只运输商品。尽管从1952年两国正式建交,但到1963年以色列驻东京的公使馆才升级为大使馆。1988年之前,从未有日本内阁官员访问以色列。日本驻以色列大使馆直至1992年7月才设立商务处。^⑬如果据此认为战后日以关系是一种建交状态下的“变相断交”,则是不恰当的。在“指导”本国大公司遵守抵制令的同时,日本政府对外公开声明,日本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无权干涉企业的

¹ See Shin-ichi Manabu, “Japan’s Middle East Policy,” *Japan Quarterly*, October–December 1988, p. 383. Kaoru Sugihara, “Japa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Economy: A note on the oil triangle,” *Japa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 4. John De Boer, “Before Oil: Japan and the Question of Israel/Palestine, 1917–1956,” <http://www.zn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SectionID=17&ItemID=7454>

^④ Hiroshi Shimizu, “The Japanese Trade Contacted with the Middle East,” *Japa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 27.

^⑤ See Raquel Shaoul, “Japan and Israel: An Evaluation of Relationship—Building in the Context of Japan’s Middle East Policy,” in Efraim Karsh eds., *Israel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 2003, p. 273.

^⑥ 参见联合国中文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gs/ga/25/25alll.htm>

^⑦ See Akifumi Ikeda, op. cit., p. 159.

^⑧ See Akira Mizoguchi,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a Retrospective of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ddle East,” *Asia-Pacific Review*, Vol. 9, No. 2, 2002, pp. 98–99.

^⑨ Akira Mizoguchi, op. cit., pp. 99–103.

^⑩ See Akifumi Ikeda, op. cit., p. 156. Ben-Ami Shillony, op. cit., p. 83. Badr Abdel-Aati,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on foreign policy: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policies towards Israel 1973–2003”, <http://www.siyassa.org/eg/esiyassa/AHRAM/2003/7/1/STUD1.HTM>

^⑪ Howard Stanislawski, “Japan’s Israel Problem”, *The New Republic*, March 1987, Vol. 196, No. 10, pp. 11–12.

^⑫ See Jonathan Rynhold, “Japan’s Cautious New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 A Qualitative Change or More of the Sa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August 2002, Vol. 2, No. 2, p. 249. (尽管日本政府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日本公司与政府保持着一种默契关系,每年政府都会对日本大公司或行业发出指导令,这些指导令虽不具有法律或行政的强制性,但政府总是采取一些诱导性的政策,促使公司遵守)

^⑬ See Howard Stanislawski, op. cit., p. 12.

行为,日本企业与以色列交易与否完全出于自愿。¹ 实际情况是,日本公司虽然不跟以色列公开进行直接贸易,但大都通过第三方与以色列保持着贸易关系。另外,个别大企业在秘密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贸易。20世纪70年代初,日以贸易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中东非产油国。^④ 但无论如何,对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家是不敢得罪的,因此日本政府常常打出“企业自愿、政府不管”的幌子,为间接贸易开脱。

以色列国内市场十分狭小,市场的有限性也妨碍了日本冲击阿拉伯国家的抵制要求。20世纪50~70年代早期,以色列也缺乏对日本有吸引力的商品,^(四)除了钻石和质量平平的碳酸钾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卖的。为数稀少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如柑橘,却因日本国内对“地中海果蝇”的限制无法出口,而且当时的以色列农产品远没有今天旺盛。

总之,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日本对中东的政策是“亲阿”而不“反以”。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日本“亲阿反以”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1973年10月18日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据各石油进口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将它们分为“友好”、“中立”、“不友好”三类,在石油供应上区别对待,日本被划为“不友好国家”,列入部分禁运类。这大大出乎日本预料,因为日本自认为在历次阿以冲突中倾向阿拉伯一方,而且一直以来“坚定”地向中东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但阿拉伯国家认为,日本对中东和平进程三心二意,它只是中东石油的一个买主罢了,而以色列对中东政策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形势发展到了日本必须清楚表明立场的时候了。十月战争中,西欧国家拒绝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无疑鼓舞了日本的勇气。^{1/4}

1973年11月2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宣布了日本对中东的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不承认以色列武力获取和占领的任何领土,要求以军必须从1967年战争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1/2}在声明的最后部分,日方指出,“日本政府将继续严重关切中东事态的变化,根据未来形势的发展‘重新考虑’对以政策”^{3/4}。声明成为此后一个时段日本对中东政策的基础。同年12月25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认为,日本可以列为友好国家,解除对日本的禁运。

继之,日本做出了一系列令西方瞠目的举动。1977年2月,在西方主要工业国中,日本第一个同意巴解组织在本国设立办事处,享受全权外交代表的待遇,但不享受外交特权。1979年12月1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首次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明确表示不同意埃及《戴维营和平协议》。该协议提出只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治和建立自治政府的需求,但丝毫不提在自决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⑤巴解组织被迫撤离黎巴嫩后,日本再次与美国唱反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⁴⁾1981年10月中旬,日本不顾美、以两国的反对,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邀请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准国宾身份访日,铃木善幸会晤了阿拉法特。1988年11月15日,巴解组织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日本立刻向阿拉法特发出邀请。在中东问题上,日本对美国表现出少有的“抗上”行为。

这些动向似乎证明日本采取了清楚的亲阿(巴)反以政策,然而,若如此理解无异于将日本对中东政

¹ See *New York Times* 21 April 1968 and 17 August 1969 Akifumi Ikeda op cit, pp 161-162.

④ See Raquel Shaoul op. cit., pp. 275-277.

(四) See Judith R. Maltz “Turning Blue and White into Yens”, *The Israel Economist* October 1986 p. 15.

^{1/4} 战争期间,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允许美国供应以色列军火的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利用它们的运输设施。结果阿拉伯产油国将英、法列为友好国家,决定对除荷兰以外的欧共体各国不削减石油供应。Naramoto Eisuke “Japan Aligned with the PLO”, *Japan Quarterly* January 1990 Vol 37 No 1 p. 19

^{1/2} See Naramoto Eisuke op. cit., p. 20

^{3/4} Naramoto Eisuke “Japanese Perceptions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0 No 3 Spring 1991 Note 2 p. 80. Yusana Kuroda op cit, pp. 40-49.

⑤ See Raquel Shaoul op. cit., p. 291. Naramoto Eisuke op. cit., p. 80

(4) See Shin-izi Manabu op cit, p. 387

策作过于简单化的解读。日美关系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曰能源，二曰安全。换言之，与石油和美国有重大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复苏与发展均依赖美国，日本也非常明了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美国是坚决反对日本参加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的。¹但因经济发展的血液——石油所系，日本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更多地从本国利益出发考虑中东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占80%，进口石油的85%来自中东。数据说明，中东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④

其次，阿拉伯国家是日本商品的重要市场，阿拉伯市场要比以色列市场不啻大于十几倍，阿拉伯国家的巨额石油收益，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市场。^⑤1977年，日本从中东的进口比1970年增加了7.4倍，日本对中东的出口则猛增16.4倍，其中成套设备的出口竟增加了60倍。^⑥这些因素决定了重实利的日本无法不“亲阿”，可以说日本抵制以色列是出于“自愿”，而不是源自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强迫。

石油重要，但作为国家的第一需求——安全更为重要，而日本的安全系于日美同盟。“日美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在日美关系和日本同第三世界利益之间真正发生冲突的话，毫无疑问，日本知道什么重要。”^⑦与日美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对中东的政策最终将归于让步。所以，将日本一个时段政策的调整视为日本政策的根本转向是不恰当的。但也不能因此断言日本对中东的政策属于造势宣传。日本对以色列政策的复杂性就在于——摇摆于在阿拉伯和美国之间。慑于美国的脸色，日本不可能走得太远。

这首先体现于日本的1973年声明。实际上声明没有实质性内容，无非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和第338号决议内容的重复。声明提出日本将根据事态发展“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⑧该表述有很大的理解弹性，既可解释为关系将更加紧张，也可理解为两国关系将走向改善。日本政府惯常在外交术语上做文章，看似简单的一个词语实际上为日本对以色列政策的棋盘上暗布一子。按照阿拉伯国家的要求，日本理应效仿个别非洲国家与以色列断交，但实际上日本甚至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都一直保持不断，遑论断交。^⑨

为了避免刺激美国和以色列，1981年日本邀请阿拉法特访日是以非官方名义进行的，由国会的日-巴友协发出邀请，对外则宣称这是一次“私人”访问，阿拉法特与日本外相、首相等政治家们进行的属于“非官方”会晤。^⑩日本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巴解组织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唯一合法”机构，只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代表，尽管巴解组织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曾多次要求日本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唯一性”。日本的这一立场同美国有关。长期以来，美国只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不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毋庸说建立独立国家了。^⑪

阿拉伯国家并非未觉察到日本对中东政策的功利主义特点，它们指责日本外交的“石油味”太浓，批评日本不关心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⑫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明了，讽刺1973年声明不是“亲阿”，而是“亲石油”政策。^⑬

总体看，1973~1985年日本对中东的政策是停留在战术层面上，过分执著于“石油”，缺乏战略眼光。

¹ See Raquel Shaoul op. cit., p. 278.

^④ See Shimizu Manabu op. cit., p. 387. 也有人称进口石油的88%来自中东，参见丁敏：《世界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网站，<http://ijscass.cn/files/geren/dingmin/youjia.html>

^⑤ 参见杨曼苏：《以色列与日本关系纵论》，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22~23页。Shimizu Manabu op. cit., p. 387.

^⑥ Raquel Shaoul op. cit., p. 274.

^⑦ Michael Stemmer “The Middle East Factor in U. S. - Japanese Relations” in Ronald A. Morse eds.,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Allianc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p. 75.

^⑧ See Naramoto Eisuke op. cit., p. 80. Yusana Kuroda op. cit., pp. 40-49.

^⑨ See Kenneth Juster “Foreign Policy-Making during the Oil Crisis”, *Japan Interpreter* No. 11, winter 1977, pp. 293-312.

^⑩ See Kurt W. Radtke op. cit., p. 529.

^⑪ See Shimizu Manabu op. cit., p. 387.

^⑫ See Valerie Yorke “Oil, the middle east and Japan's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1981, Vol. 57, No. 3, pp. 442-443.

^⑬ See Ben-Ami Shilony op. cit., p. 84.

从“亲阿反以”到“阿以平衡”

受石油影响的日以关系也必将随石油的变化而动。1985年石油大降价引发了日本对以色列政策的调整。

为了打击苏联依靠出口石油创汇的政策,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手操纵国际油价,导致了1985年11月世界石油价格的突降。每桶原油的价格从30美元跌到了12美元。¹在1986年7月跌到最低点7美元。此后油价虽有回升,但长期在每桶15~20美元之间(1985年为每桶32美元)波动。^④

但日本的石油进口量非但不增,反而急剧下降,这是因为美国为对付日本巨额贸易黑字,逼迫日元升值而导致日本经济萧条所致。1986年在日本进口支出中石油突然下跌至进口总比重的15%;而上一年比重为26.7%。^④1989年进一步下跌到11%。能源需求锐减,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份额逐年减少。石油之于日本经济影响的程度不再如昔。再加上受到两伊战争的打击,中东国家大多经济状况恶化,各国购买力下降。讲究“实效”的日本已无需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对阿拉伯国家惟命是从,在联合国论坛上不再一味迁就阿拉伯而批评以色列,日本把对中东政策调整为——在阿以之间建立“平衡”。

1985年是转折之年。这一年9月以色列外交部长兼副总理沙米尔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以色列政府高官第一次访日。日本为了避免刺激阿拉伯国家,诡称之“商业之旅”^{1/4},继而两国开始了大量“非官方”来往。10月以色列财政部长莫代和不管部部长阿伦斯访问日本。1988年6月,日本外相首次访问以色列,标志着日以关系进入新阶段。1989年2月,以色列总统受日本首相竹下登之邀赴日参加天皇裕仁的葬礼,其间同日本首相竹下会晤,竹下表示日本愿在中东发挥更积极的协调作用。^{1/2}1989年和1990年日本分别邀请了阿拉法特和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阿伦斯访日,日本的“阿以平衡”政策的实施达到巅峰阶段。

日本对以色列政策的调整与中东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的调整是“合拍的”。

1982年巴解组织被逐出黎巴嫩后,颠沛流离于各阿拉伯国家却难寻安身之地。经过长达6年的流浪,阿拉法特决定与以色列妥协,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建国目标。1988年11月他宣布采取“现实性政策”,放弃了不承认以色列、拒绝与以色列接触的传统僵化思维,准备与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妥协”。巴解组织态度的转变,无疑与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合拍的。在此背景下,1989年10月日本政府再次邀请阿拉法特访日。前次的访问邀请是由日本国会中的日-巴友协发出的,而此次却是由日本政府正式发出的,可视为日本政府承认了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政府的地位,虽然还未从官方意义上正式承认它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会见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请求日本积极参与到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中,对此,海部俊树积极回应,答应将给与援助。^{3/4}

阿拉法特前后两次访问所受的待遇,反映出了日本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冷暖。1981年10月,阿拉法特访日时,日本商会会长和日本13个商业巨头纷纷会见阿拉法特;到1989年访问时,商业机构领导人都不再与阿拉法特见面。阿拉法特体会到了被冷落的感觉,愤然而无奈地提醒日本,中东有一个2亿阿拉伯人的大市场。^⑧然而,因石油价格狂跌,阿拉伯产油国的购买力也因之剧降,阿拉伯市场对于日本的吸引力也大不如从前,从1986年起日本对中东的出口大幅下滑。^(t)据日本海关统计,与1981年日本对中东出口高

¹ 《美国:用经济战打垮苏联》<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8012/58019/4091095.html>

^④ 新华社:《欧佩克能否左右世界石油市场》, <http://www.sxet.com.cn/ecobook/industry/energy/0726-1.htm>

^(四) Kaori Sugihara op cit, p. 8

^{1/4} Badr Abdel-Aati op cit.

^{1/2} See Akifumi Ikeda op cit, p. 163 Badr Abdel-Aati op cit.

^{3/4} See Naramoto Eisuke “Japanese Perceptions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p cit, p. 81

^⑧ See *Japan Times* 3 October 1989.

^(t) See Kurt W. Radtke op cit, p. 527.

峰年相比, 1987年日本对中东出口从 4.0795兆日元降到 1.4303兆日元, 下降了 64.9%。由居中东地区最大的供应商跌落到第三位, 落在美、德两国之后。¹

与这一趋势相反, 日本与以色列的贸易却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1986年, 据以色列政府统计, 日以贸易额约 6亿美元, 其中以色列出口 3.23亿美元, 进口 3.07亿美元, 出口比上年增长 50%, 进口增长 61.3%。^④但因两国关系仍未正常化, 这一切都是通过中间贸易的方式实现的, 1992年之前日本驻以使馆没有设立商务处。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 令日本最担心的源自阿拉伯产油国集体报复的风险与 20世纪 70年代相比大大降低, 甚或说不存在了。埃及单独媾和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大分裂。两伊战争继而引起了阿拉伯世界新的分化、改组;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战争, 把阿拉伯世界再次推向四分五裂, 泛阿拉伯主义几近销声匿迹。海湾战争还加剧了亲西方和反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情况使中东阿拉伯国家无法团结起来“惩罚”不遵守抵制政策的外国公司。日以关系正常化的大气候就要成行。

日 以 关 系 “ 正 常 化 ”

冷战的结束没有使以色列失去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 相反, 美国更借助以色列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是新时期美国扶植以色列的重要内容。1992年初以色列先后与中国、印度建立外交关系, 允许日以关系继续非正常化显然不符合美国对中东的战略。^④日本的外交原则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 它可以漠视亚洲甚至欧洲的声音, 但美国的声音却是必须恭听的。冷战结束后, 美国国内的犹太院外集团趁机游说政府对日本的以色列政策施压, 建议布什政府通过日美贸易谈判, 逼迫日本放弃名存实亡的抵制政策, 改善日以关系。^Ⅱ

1991年 4月 4日,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旧金山会晤。布什呼吁日本放弃抵制政策, 树立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自信。海部俊树表示日本将考虑改善日以关系, 不会再一味顾忌阿以矛盾。海部俊树的表态被称为日以关系的“历史性”发言。不久, 日本丰田公司宣布停止对以色列贸易禁运。尽管此前日本汽车如三菱、本田、铃木早已进入以色列市场, 但大多是经过代理商。因此, 丰田的进入不仅仅具有商业意义, 还体现了政治意义。^Ⅲ

海湾战争加快了日以关系的发展步伐。“沙漠风暴”行动发起后, 日本政府也刮起了对以外交“旋风”。从 1991年起, 几乎每年都有日本首相、外相或特使访问以色列。面对日本频频摇动的“橄榄枝”, 以色列亦有新的打算。它认为苏联解体后, 除美国以外数日本最为强大, 必须拉紧日本。以色列甚至表态, 它赞成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Ⅳ日以关系迅速走进蜜月。

日、以直接贸易的洽谈随之进入正题。1992年 2月, 一个庞大的以色列商业代表团访日, 代表团会晤了日本外交部门、经济机构及各大公司的首脑人物, 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国际工贸部几乎全部批准了对以色列出口许可, 包括那些长期以来日本反对的出口类别。同年 7月, 日本驻以大使馆商务处正式设立, 至此日以关系完全实现了正常化。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日本成为 2000年度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¹

冷战虽然结束, 但影响日本对中东政策的两个因素(石油和安全)却没有改变。随着日本经济复苏, 2002年石油进口大幅增加, 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再次高达 80% (中东石油在日本进口石油中的比例), 同期法国为 35.9%、英国 11.4%、美国 19.9%、德国 1%。^④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本仍然需要严重依赖中东石

¹ Akifumi Ikeda op. cit., pp. 163-164

^④ Ben-Ami Shilony op. cit., pp. 83-85

^④ See Raquel Shaoul op. cit., p. 282

^Ⅱ See Akifumi Ikeda op. cit., p. 155

^Ⅲ Ibid

^Ⅳ 参见杨曼苏: 前引文, 第 23页。

油。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决定了日本既需要保持对美国的协调，又必须把能源外交置于重要位置。

与冷战之前相比，日本对中东认识的提高在于：对中东政策的核心是保证石油的稳定供应，因此力图使中东的政治稳定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中东问题不是片面的亲阿拉伯或者亲以色列就能奏效的，也不是在阿（巴）以之间玩弄平衡即可应付裕如的。从 1979年以来中东地区频发的冲突，如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以及后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事件表明，不仅阿以矛盾是中东冲突和危及中东稳定的主要因素，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间的冲突也同样威胁到中东的和平与稳定。海湾战争标志着日本新的中东外交政策的开始，此后日本对中东的政策从“平衡外交”调整为“保持中东政治稳定”。

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日本积极插手中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依靠“金元外交”挤进马德里和莫斯科中东和平会议。日本政府要员频繁出入中东，以期通过与各国领导人的对话，扩大日本对该地区事务的影响。依靠援助，将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邀请到日本，试图“主导”中东和平进程。^(四)为示公平，2000年 8月巴以戴维营谈判破裂、暴力冲突升级后，日本与国际社会一道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停止暴力活动，回到谈判道路上来。

尽管日本如此活跃，但美国不会允许日本“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日本在中东问题上只能居于服从美国的地位。日本曾向鲍威尔表示希望在中东发挥积极作用，自认为不只是能提供金钱，也有参与的能力和理想。^{1/4}美国对此置之不理。由于美国的抑制，日本未能参加 2003年 1月 13~ 14日由英国主持，美、欧、俄、联合国参加的中东四方会谈。日本处理对以色列的关系，只能在美国许可的框架范围内进行。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See Badr Abdel-Aati op. cit.
^(四) Akira Mizoguchi op. cit, pp 99- 103
^(四) See Ryoji Tateyama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JME Review*, Summer 1994 pp. 73- 74
^{1/4} See Raquel Shaoul op. cit, p 290

• 资料库 •

伊朗专家会议

“伊朗专家会议”于 1982年 12月成立，是选举伊朗革命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1982年，经霍梅尼批准，伊朗在全国举行了首次专家会议选举，随后，第一届专家会议成立。

伊朗专家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最高领袖行为，在最高领袖不称职或失去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最高领袖。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去世后，如无适当人选，应由权威的宗教法学家组成专家会议，负责推选一名符合条件的宗教学者担任

新的最高领袖。
伊朗专家会议成员候选人须具备下列条件：可靠和品行端正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在著名宗教学院受过教育的宗教学者；具有政治和社会见解、熟悉当前事务和没有消极的政治社会背景的人士等。

伊朗专家会议成员是根据伊朗各省市的人口比例从教法学家中选举产生，任期 8年。伊朗专家会议现有成员 86人。

(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安春英 摘编)

Japan – Israel Relation Drifting between Oil and Security

Guo Peiqing

pp. 36– 42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Israel are oil and security. Japan – Israel relation often drift between Arab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se two factors. Before 1970s Oil Crisis, Israel – Japan relation was a little slight. After 1973, Japan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pro – Arab states and anti – Israel.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role

of oil, Japan tried to play the balance between Arab states and Israel.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apan – Israel relation realized the normalization. Now Japan tries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stability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oil. The factors of oil and security definite the contains of Japan – Israel relation, which seems to strengthen in the future.

Legal System of Palestine History and Reality

Yao Huina

pp. 43– 48

There is a structural drawback in the legal system of Palestine. Besides the current laws published by the autonomy, many other laws are effective in territories, such as the Jordan's law in West Bank, the Egyptian law in Gaza, Israel military law, Britain's Mandate law, Islamic law, customary law, even if the Ottoman Empire's law. These law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common law system and Islamic law system, and some of the laws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These laws are in confusion and beyond the times, and they become the

obstacl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alestinian autonomy is trying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t laws, but the legal system progress seems too slow. Because of the stop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negotiation, the issue of final statute of Palestine is deadlocked. The reason is that on one hand, the autonomy has no stronger power to affect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bod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ten interferes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bodies.

How African States Can Learn from China's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Li Zhibiao

pp. 49– 54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contains both successes and faults. The highlight of China's successes is to follow the way of gradual marketing reform, and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triangle relations between stabili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carried out the opening up policy in the basic of self – reliance. China emphasizes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ver 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ree Agriculture Issue”, and supports the reform attempts of regional governments. The faults of China's experiences are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the enlar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appearing problems in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etc. The African states should realize the same and different cond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mselves, and learn more about China's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and try to seek the suitable ways to develop their nations.